

中山王響器文字編

張守中譔集

單字

兆域圖二例
其一 楚其 一 廡質

冢 一 石三百五十五刀之冢

盃 一 东库：二七
十一年

圓壺 一 石三百卅九刀之冢

圓壺 一 东库：七
冢 一 石三百刀之冢

圓壺 一 西库：二七 二例 十一年
冢 一 石八十二刀之冢

圓壺 一 西库：一九
冢 一 石百卅二刀之冢

帳杆母扣 一
車馬坑：三〇之五

帳杆子扣 一 車馬坑：三一之一〇

帳杆子扣 一 車馬坑：三三之一

大鼎 一 三例 項 一、獲其均於 一 施、張為 一 宗、裁 一 才 衍、
智為 一 臣之宜施、後 一 其庸用之、昔者吳 一 并寧、

方壺 一 五例 下不思於 一 施、項 一 非之、為 一 臣而飯臣其宗、
栝諱 寧敬則 斂 一 至 屬 忌 深 則 斂 一 新、

大鼎 一 斂 數 備 恣

兆域圖 一 夫 一 堂

力



大鼎 一 嘉其 一

人



中山王響器文字編

張守中撰集 1981年5月 北京 中華書局出版
16開 158頁 報紙本 柯式印刷 索綫訂 平裝

一九七七年夏，河北省平山縣出土了大批帶有銘文的器物，計銅器九十件，玉器二十六件，木器兩件，共一百一十八件。銅器中既有禮器、兵器，也有雜器、車馬器，還有首次發現的兆域圖。出土銘文總計二千四百五十八字，僅大鼎、方壺、圓壺、兆域圖四器，即有銘文一千五百七十三字，尤以鼎、壺鏗鏘可誦之長銘為最具特色。這批文字，無論其內容之豐富，銘辭之詳贍，字體之秀勁，刻工之精美，都是歷史上罕見的。張守中先生有機會接觸原器原物，對所有響器銘文反復進行臨摹和校核，在各家考釋的基礎上，輯成《中山王響器文字編》，這對歷史考古工作者、特別是對古文字和書法篆刻研究者來說，確是一本難得的工具書。

《文字編》分為三個部分：第一部分收單字五百零五個；第二部分收合文十三例；第三部分錄存疑字十九個。全部按楷釋筆劃順序編次，每字首冠楷書，下列響器文字各種異體，每體分別注明所見之器名或器號，並錄例詞例句以為參考。本書卷前有張領先生序及凡例，卷後附響器拓本、摹本、器目表及檢字表，書末為“後記”，總一百五十八頁。一墓文字以此編為最富，也是第一部專集同墓文字成編的字書。

這批文字的價值是多方面的。首先是它有確切的“國籍”和年代，與過去大多數戰國文字只據傳聞不明所出或僅籠統斷為先秦、晚周者大不相同。中山王響究竟屬於中山國世系中的哪一位王，說者雖未取得一致意見，但從器銘中透露的史實分析，響王應是中山復國之後曾參予齊宣王伐燕戰役的一位國君，他有感於燕王噲讓位子之之失敗，特地“明則之于壺”，諄諄告誡後世子孫，從中吸取教訓。可以看到，復國後的中山國君即使在對燕戰事得利的情況下，仍然對國家的前途憂心忡忡。這種複雜的感情、說明器之制作當在合齊破燕之後不久的時間，即前公元前313年或其前後。其次，這批豐富的文字資料大可補足史籍記載的缺佚。二千多字的地下原始史料重見於世，不但使中山復國後這一段為史書所失載的歷史空白得到填補，而且使傳世有限的中山國零星史料也得到印證和系聯，其價值，自非往日所出一二單字或片語殘辭所可比擬的。第三，從文字學的角度看，這二千四、五百字的資料中，即有單字五百餘個（本書第一部分所收），比《說文》收錄的戰國古文還要多，且其中約有一百四十餘字是第一次出現的。這就大大

地豐富了戰國文字的寶庫，使古文字字書的編纂，添了一大批前所未見的新資料。而四、五百字的長銘本身，也為文字的考釋提供有利的條件，如全之為百，茻之為葉（義同年），𠂔之為尺，𠂔之為施（讀為語氣詞之“也”），𠂔之為少長之少，以及𠂔之讀為一等，倘若沒有上下文的聯繫而只是孤立地出現，其確切涵義是很難確知的。以彈丸小國之中山尚且有如此發達的文字，可想到戰國時昭昭赫赫之大國、其文化自然是更加輝煌無比的。中山地處齊、趙、燕三大國的包圍，其文化（包括文字在內）亦必不可免地受到周圍大國的影響。換言之，這批文字不獨對研究中山文化大有價值，對於研究同一時期各國文字的相互關係也是一根可靠的標尺，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。值得強調的是，五十多年前王國維先生指出出土戰國文字與傳世古文為“一家眷屬”的事實（見王箸《桐鄉徐氏印譜序》，載《觀堂集林》卷六），在中山王響器文字中也得到充分的證明。據筆者粗略統計，響器文字與《說文》古文，三體石經古文，以及《汗簡》等傳世古文相同或相近的，竟達三、四十個之多，且響器中不少難識之字與難通之義，借助于古文一系的材料，便可越過障礙，豁然通達。如釋響為數，釋詳為善，釋旃為看，釋聆為聞，釋恣為勞，釋捩為辜，釋𠂔為鄰，釋𠂔為簡等，若無傳世古文以資參證，亦是難得其解的。可見出土戰國文字與傳世古文血脈相通，確是“一家眷屬”，前者是當時的通行文字，而後者則是前者的遺留。張頌先生在本書“序”中還列舉彘、緄、復、渴、𠂔、且等字與《汗簡》相較，發現契合之處甚多，因提出“今天對《汗簡》一書似有重新估價的必要”。這是非常正確的。在今天戰國文字出土日多的情況下，《汗簡》一類的古文自有所本，已被越來越多的材料所證明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《中山王響器文字編》的出版，對疏通傳世古文與出土戰國文字之間的關係，也起着積極的作用。

此外，張守中先生的摹本忠實于原銘，不止要其形似，更求其神合。看他運筆輕重有度，旋轉自如，使刻劃剛柔相濟，頗存刀筆神韻。沒有機會摩挲實物的人，也可彷彿古人章法，與一般字書比較，可算是本書的特色。

曾憲通